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主编

士人心态话儒林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主编



士人心态话儒林

陈文新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鄂) 新登字第 10 号

士人心态话儒林

陈文新

责任编辑 李富轩

*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昌喻家山 邮政编码 430074)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沔阳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48 000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ISBN 7-5609-0931-0/G · 96

定价: 6.70 元

作者简介

陈文新，男，1957年8月出生于湖北公安。文学硕士。现为武汉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公开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及古典诗词鉴赏二十余篇。出版有《中国文言小说流派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中国咏物诗丛书》（合作，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古典文艺实用辞典》（执笔小说、戏曲及元明清诗文部分，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小说自诞生之初，便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雅俗大众，此种情形中外皆然。中国的小说时代开启于明清，当时的人们，无论社会上层还是下层，都以一种痴迷的心情迎接一部又一部小说的问世：《三国演义》书成，时人“争相誊录，以便观览”。“上自缙绅先生，下至草莽齐民，于诸子百家之书，或不能悉备，备亦不能悉读，而独至稗官野史则必搜罗殆遍，读亦殆遍。至《列国》、《三国》，则尤家置一编，虽妇人女子，略识之无者，且时时偷针黹余闲，团坐老幼，以曼声演说之，为消遣计”（啸庐：《中外三百年之大舞台序》）；《水浒传》出，“上自名士大夫，下至厮养隶卒，通都大郡，穷乡小邑，罔不目览耳听，口诵舌翻，与纸牌同行”（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严复因此断言：小说“入人之深，行世之远，几几出于经史上，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天津国闻报附印说部缘起》）。梁启超也指出：“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由此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生成的动态过程中，古典小说起有经、史、子、集无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作为前代的文化遗存，中国古典小说能

挟“不可思议之力”进入中华文化发展的纵向链条之中，重要的动力还是在于代际传播的社会性的文本读解。

所谓文本读解，即用当代语言翻译出古典文学活动的某个方面的意义，其实质是从当代人的理解力、情感与趣味的深处发掘古典精神。在后人的读解中，古典小说经历着一种意义的展衍、附加以至变形的过程。文本固有的意义与增益的意义，旧的因子和新的创造，在读解活动中杂错交糅，赋予古典小说一种意义性的存在，它使中国古典小说同化于当代文化，进入当代人的理性世界。

中国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表现为多种样式。评点、考证、评论、鉴赏、漫话、编选为其荦荦大者。不同型态的文本读解不仅使古典小说获得意义性张扬，而且将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雅与俗绾结于一身。雅由此普及于并提高着俗，俗亦由此回流，上升为雅。古典小说对读者的感应，也因文本解读而由潜在转为显在，由艰难转为浅易，由浅易转为深入。

当然，任何时代的文学作品的读解总是受制于那一时代的思维水平与文化氛围。宋人注杜诗，便随意穿凿附会，于是，“咏月而以为比肃宗，咏萤而以为比李辅国。……谓纨绔下服比小人，谓儒冠上服比君子”。《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此种诠释方式使诗家“无景物”、“无字句”，杜诗的艺术之美遂不复存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杜诗据〉提要》）。50年代以来的古典小说读解因特殊的文化背

景而表现出浓厚的政治化倾向。各种形式的文本读解惯于以二元对立的致思方式去解说作品所负载的意义，古典小说中纷繁多致的文学现象被片面地归纳为是揭露黑暗还是粉饰太平，是维护封建道德规范还是反抗礼教，是正确进步还是错误反动。这样一种非此即彼、非好即恶的文本解读方式在今天看来显得是那样肤浅谬误，但在那一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氛围中，却是不可避免的存在。

时代风气制约着文本读解，读解者的文化素养与知识结构也直接关系文本解读的水平。60年代前后的文学研究领域，由于过早的专业化训练，相当一部分文学史研究者眼界狭窄，趣味单调。虽说专精有望，但难得博大。其文本读解也因此滞留于古典小说文学现象的浅表层次，缺少灵气、魅力与哲理性思考。

随着视界的日益澄清与渐益开阔深入，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开始突破昔日片面化和简单化的局限，向古典小说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审美趣味回归，从而在古典小说的意义阐释中开拓出了多角度、多层次的广阔发展前景。

《中国古典小说谈丛》就是在当代文化精神感召下编撰的一套丛书，它着意于挖掘古典小说中可供现代人感知、领悟、吸纳的内容，更将对古典小说意义的认识由一般社会历史论转向对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乃至心灵深处的解剖。为此，它在古典小说的文本读解上一改传统思路，不再胶执于主题、背景、

形象、手法等文学史的老话题，而是以古典小说中的某一细节、某一人物、某一场景为“筌”，为“筏”，进而从文化学、美学、心理学、历史学诸方面生发开，在纵横开阖、无格可循的“书里”、“书外”之谈中，抒写作者厚积薄发的学问体验和人生感悟，展示中国古典小说的丰厚文化内蕴。在这样一种作文法中，传统的知识结构与治学套路不免困窘苍白，跳跃的思维、灵活的意念、开阔的视野、机敏的感悟则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尽管，囿于学识和功力，本丛书还存在诸多未臻精妙之处，但对于传统文学史研究来说，它是一个有意义的突破，这就是有意识地借助文化学、社会学以及其他学科的新视野去观照古典小说。对于时下的文化史研究来说，它亦不无扩宽视界、别开生面的补益之效。而这一点，正是笔者策划、组织这套丛书的初衷，也是本丛书编撰同仁和衷共济、勉力于写作的潜在动力。

本丛书策划之初，曾得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桑士显君热忱推动，今桑君英年早逝，人往风微，远想慨然。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领导及参加丛书工作的各位编辑全力支持此套丛书的出版，从而使笔者以文化学眼光观照中国古典小说的构想最终形诸一本本独具神彩的文化品，特此致以深切谢意。

周积明

识于武昌水果湖寓邸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内 容 提 要

中国古代的读书人，一向位列于四民之首（士农工商），他们究竟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怎样？在正剧与喜剧的舞台上，他们呈现出什么样的心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书以庄谐并陈的小品笔墨，指点《儒林外史》的文化意蕴，谈论有关掌故轶闻，看似信手拈来，实则兼求厚重，能使您在轻松的阅读中，领略到《儒林外史》的丰厚意趣，了解明清文人的个性风采。

目 录

关于《中国古典小说谈丛》	周积明
一部关于士人心态的专书	(1)
名士王冕	(10)
“虞博士是书中第一人”	(15)
“须要学两件寻饭吃本事”	(21)
严光与庄绍光	(27)
吴敬梓曲解《溱洧》	(32)
少卿敬梓异同辨	(37)
祭泰伯祠·定梨园榜	(42)
内淳朴而外放纵	(47)
时知县“礼贤下士”	(52)
娄公子“三顾茅庐”	(58)
权勿用的怪诞	(63)
“山人”的真面目	(67)
“借幽雅以博荣名”	(72)
才子的优越感	(76)
“不颠不狂，其名不彰”	(80)
斗方名士	(85)
“呆名士”	(89)

“名士”的尴尬·····	(94)
“侠客”张铁臂·····	(98)
“负气斗狠”的沈琼枝·····	(103)
凤四老爹·····	(109)
豪侠与女色·····	(114)
范进考中秀才的奥秘·····	(119)
举人的身价·····	(123)
八股与诗赋是否相通·····	(129)
鲁小姐的功课·····	(134)
文人墨客的相互攻讦·····	(140)
马二先生为何不能中举·····	(146)
话说“揣摩”·····	(151)
学问与功名的矛盾·····	(156)
八股取士的效应·····	(161)
“一冷一暖，谓之世情”·····	(166)
“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	(171)
“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	(175)
严监生与两茎灯草·····	(180)
并非误笔的“关羽填词”·····	(186)
“神仙”的伎俩·····	(190)
“朋友自有朋友之情”·····	(195)
欺世盗名者的愚蠢·····	(201)
闲话风水·····	(205)
聘娘效颦·····	(210)
山水隐逸·····	(214)
田园风光·····	(219)

《女曰鸡鸣》新解	(224)
秦淮风景	(227)
南京的几处名胜	(233)
诗境入小说	(238)
有激之言	(243)
横看成岭侧成峰	(248)
吴敬梓的小说结构观念	(253)
后记	(258)

一部关于士人心态的专书

中国知识分子形成一个自觉的社会阶层是从春秋战国时期才开始的。

在传统的社会结构中，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担子几乎责无旁贷地落在知识分子身上。古埃及的祭司阶层，印度的婆罗门，中国古代的士，都以解说历史、提供社会生活模式为其天职。这种阐释世界、指导人生的角色使知识分子踞于一个极其显赫的位置上，大睨雄谈，意气扬扬。西方教会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已为世人熟知。中国古代的士，尽管气概稍逊，却也充满了对自身历史使命的信念。据《史记》记载，孔子曾被匡人围困，情形非常危急。当时，孔子对弟子们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天如果未丧失斯文（指礼乐制度）匡人能把我怎么样？以“斯文”的承担者自许，孔子所代表的知识阶层的这种自尊心态，显示了早期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和豪迈感。

士阶层的独立性从一开始就是相对的。士的祈向是“仕”，即做官。“士之仕也，犹农夫之耕”，这是读书人生存的基本手段。而社会并没有为每个士人先天地准备好职位，要仕，就必须赢得君王的信

赖。在政治领袖的权势的挤压下，士的豪迈气概有可能为谦恭所取代。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有三件惧怕的事情：怕天命，怕有德有位的大人，怕圣人的言语。这就隐隐约约地流露出对权势者的恭敬。但孔子身上更多的还是尊严感，他强调：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道”比权势更具永恒的价值。士是“道”的承担者，理当在君王面前挺直腰杆。无疑，这要付出代价：自尊、自爱的伴随物往往是不仕，不仕又往往意味着贫困。故孔子反复表示：士，应当安贫乐道，决不为了富贵而出卖人格；读书人有志于道而又视贫贱为可耻，这种人不值得交谈；“枉道而从势”，“曲学以阿世”，放弃以道自重的节操，就不配称为士。

孔子这种以道自任的尊严感，在战国时期的孟子等人身上得到进一步弘扬。孟子傲然宣称，天下最值得看重的有三个方面：社会地位、年龄和道德。在朝廷，社会地位最重要；在乡里，年龄最重要；但真正具有普遍和永恒价值的，却是道德。孟子即自许为道德的承担者。以这种气概与君王打交道，我们眼中的孟子，充盈着“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有胆识，有热情，有风度，有气魄，从不在君王面前低三下四，倒是常摆出师长的架势。“一编书为帝王师”，孟子的言行较孔子更富诗意。

然而，秦汉以降的大一统的专制政权却力图横扫士阶层的这种浩然之气。他们希望士阶层依附于皇帝，他们不能容忍士阶层以帝王师自居的传统，他

们想方设法诱逼读书人服从自己。在种种针对士阶层的措施中，始于隋唐的科举制度格外行之有效。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唐〕李肇《国史补》所引用的这两句诗道破了帝王实行科举制度的主观愿望。统治者对于读书人仕进关口的控制，尤能体现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者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大一统天下的特有产物；只有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才能大规模地实施这一制度。因此，这一制度本身便威风凛凛地宣告了帝王（“势”的代表者）对士（“道”的承担者）的优势。

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的心态如何？这好像是个特殊问题，只涉及科举制度与士人心态的联系，但实则具有广泛的意义：科举制度下的士人心态不妨视为专制制度下士人心态的一个缩影，不过某些局部略有差别而已。比如，“道”与“势”的矛盾，汉魏与明确有程度的不同，但并无本质的差异。（笔者的意思并非全盘否定科举制度，事实上，它在唐宋时期曾发挥过相当多的好作用，在明清时期也并非一无是处；我们只是从它影响知识分子心态的角度作出评价。）

〔清〕吴敬梓异常关注知识分子的命运，他的名著《儒林外史》便是一部关于士人心态的专书。作家执着于知识阶层的历史使命，痛苦于部分读书人对自我意识和独立性的放弃，满怀悲壮之情地展示了科举制度下士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向社会、向历

史、向未来发出了响亮的呼吁：读书人，保持你的自尊和高贵！

且让我们走近这部名著，先作一番宏观的巡礼。科举制度强有力地削弱了知识阶层的独立性。读书人向来看重个人价值。在“以成败论英雄”的世俗背景之前，怀才不遇的读书人常寄慨于知音难得。著名的高山流水的故事结束于钟子期死，伯牙终身不复鼓琴，愈显出个体价值得不到鉴赏的凄凉。科举制度将确认识识分子价值的标准空前地简单化、程式化了：榜上有名即意味着学识过人，名落孙山则证明了其学识浅陋。万中书推想迟衡山、武正字的学问“必也还是好的”，高翰林当即不容置辩地下结论道：“那里有什么学问！有了学问倒不做老秀才了。”功名成了学问的标尺；要证明自己有学问，便非挣个功名不可。浦墨卿也认为“读书毕竟中进士是个了局。”他还举了一个例证：先年有一位老先生，儿子已做了大位，他还要科举。后来点名，监临不肯收他，他把卷子掣在地下，恨道：“为这个小畜生，累我戴个假纱帽！”这老先生何以如此热衷于进士的功名？想来绝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名——为了证实自我的价值。

以科名的得否作为衡量学识的标尺，这标尺可靠吗？明朝的解缙、胡俨一同去看进士榜，解缙因为胡俨不是科举出身，就指着进士榜，说这黄榜上头都是些大丈夫。胡俨笑道：其中也有侥幸中榜的！胡俨的意思很明确，科举考试存在偶然性，中进士、

登高科的，不一定就有学问。因此，迟衡山不无愤激地提出：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把学问与功名放在了对立的位置上。

举业无凭，功名偶然，于是信命数，信风水；于是，不求文章中天下，但求文章中试官。部分读书人的这种畸形心态，《儒林外史》一一作了喜剧性的展示。王惠煞有介事地宣称：他的八股文中“尤其精妙”的“后面两大股文章”“不是俺作的”；“虽不是我作的，却也不是人作的。”原来是伏着打盹时受了鬼神的启示。这就大有“命里该中”的得意气概。而高翰林之论“揣摩”，则表现了部分士人但求高第、不讲实学的心态。

实行科举制度的理论宗旨之一是把读书人培养成为熟悉儒家经典并根据它来为人处世的君子。但“主卖官爵，臣卖智力”，这种潜在的买卖关系却促使一部读书人从开始就以“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为目的，眼睛直盯着功名富贵。民间社会对于功名富贵的迷信仰慕又鼓励了这种倾向。马二先生说：人生世上，除了文章举业，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所谓“出头”，其一是扬名显亲；其二便是物质利益了：如范进中举后，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使王惠、王德、王仁、严贡生、匡超人等孜孜以求科名的，不就是名、